

◀ (上接3版)

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相比之下,或见高低,却不妨碍萧政自己也成为时间管理的高手。交通问题几乎是每一座大城市的痛点,洛杉矶也不例外。在美国时,萧政都是五点钟准时来到南加州大学校园,六点钟学校游泳馆一开门,他就第一个跳进泳池,等他老人家神清气爽地“上岸”休息,已经是一个半钟头以后的事情。“没办法啊,我游得慢,只好多花些时间。”然后,他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此萧先生深信不疑。他常常建议友人多多运动,珍重身体:“一定要把运动当作每天的第一件事情去做,这样总可以坚持下来的。否则一忙、一累,运动的事就被耽搁了。”

中国的经济学家手头摆着无穷无尽的、新鲜的课题

在美国,一位学术杂志的主编通常最多可以任职三至四年时间。对此,曾任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Journal of Econometrics*)主编的萧政给出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可能降低期刊主编个人好恶对于学术研究方向的影响”。对于学术杂志,尤其是权威期刊而言,其发稿量势必远远低于它收到的投稿量,那么如何选择文章刊发?除了审阅人的评判,主编的个人喜好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久而久之其个人价值取向难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学术研究的方向,所以学术杂志“只有不断更换主编,才能够不断地激发学人的创新思想”。

“经验”与“平衡”之间该如何寻找支点?萧政建议,中国学术期刊主编的任期也可以相对缩短一些,其中有利亦有弊,但在激发学术创新层面的影响应该更多会是正面的。

常常有人抱怨,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很难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对此,萧政却不以为然。事实上,今天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新的经济现象,西方社会或许还未曾遭遇,但在未来可能也会遇到,那么中国学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就走在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发表”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萧政认为,中国的互联网

经济颠覆了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传统经济学思维。传统货币经济认为,货币供给量乘以货币转手次数,就得到了整体交易数量,而交易数量又与国民生产联系在一起。所以,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利用货币影响干预经济行为。可在当前的互联网经济环境中,人们扫一下二维码就完成了一次交易,平均转手数量无法测算。面对新技术,传统货币政策的思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无疑给中国经济治理出了一道难题,也给中国的经济学家

在。

多年来,经常会有学生找到萧老师抱怨:“不知道该如何找到研究题目。”每每这时,萧老师都会引用当年恩师雨宫健(Takeshi Amemiya)教授告诫同窗的那句“你先去找到别人文章当中错误或可改进的地方”,从纠正别人的错误开始,逐步深入,研究空间就会渐渐呈现在你的面前,进而帮助研究者建立自己的分析方法。

翻开硬币的另外一面,面对任何一篇学术论文,一定会有人鸡蛋里面挑骨头,“这个



◀ 萧政夫妇与父母合影

▼ 上世纪20年代,萧铮夫妇与德国土地改革运动大师达马烈克参加会议后合影。



出了一道全新试题。但事实上,机遇永远与挑战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积累了经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方面丰富的、独有的研究题目。上世纪80年代,萧政本人是非常支持乡镇企业的,因为在那个历史阶段乡镇企业表现出强烈的求赢、求进、求发展的欲望与动机,表现出更优的经济效率。而今,他对于乡镇企业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因为,经过了中国经济40年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生产工具已显粗简,生产效率难免相形见绌。曾经,萧政眼里的贵州可谓山清水秀,“论旅游资源,个人认为那里比英格兰湖区(Lake District)漂亮多了。于是,今天再见那些乡镇企业吞云吐雾的烟囱就觉得非常刺眼了,很多经济现象已经‘此一时,彼一时’了”。在萧先生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手头摆着无穷无尽的、新鲜的课题,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优势所

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想想,这就是个人学术进步的机会”。萧政常常对学生讲,他最欣赏老一辈数学家陈省身的那句“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从事学术研究不要想着立刻致富,“没有人理无所谓,我只要专注下去,总归会有所发现”。

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依旧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

好的学风可以助力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学研究而言,好的学风甚至可以助力一国经济、世界经济的长足发展与进步。萧政担任《计量经济学》主编期间,曾收到老师安德森(T.W. Anderson)寄来的文章。审核过程中,审阅人发现了文章中存在的谬误。于是,萧政提笔致信恩师,直言文中的不当之处。安德森也

不介意,并很快回信,确认此处确为疏漏。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与“改进”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萧政看来,美国人那种“不管不顾”的精神对于科学研究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值得肯定和借鉴。中国人的“人情关”当破、必破。

2016年春天,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及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邀请是年72岁的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奖得主、经济理论学家吉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在学术杂志上公开发文,提出质疑。故事至此,看似杂糅了很多尴尬与不悦,其结果却如同童话般完美——恰恰是基于德布鲁的质疑,麦克法登改良了自己的模型,使其学术价值得以提升。为此,两位经济学家在人们心目中所赢得的敬意非但没有打折,反而各自收获了更多的掌声。

萧政认为,早期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往往关注比较大的问题,目标比较宏大。近年来,

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来校演讲。其间,赫克曼教授自曝其办公室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Crash my ego!”(来打倒我吧!)。萧政认为,恰恰是这种开放、勇于甚至乐于接受各方质疑的胸襟,成就了一名优秀的学者,帮助他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因为,竞争才是进步的原动力。

课堂上,萧政常常对学生说,“做学问,就是要追求真理”,紧跟着会讲一个发生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间的小故事:萧先生还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加州计划建设连接旧金山湾区的长距离公共交通设施,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得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丹尼尔·麦克法登(Daniel L. McFadden)受邀论证该项目的“性价比”。大量的抽样调查、统计分析过后,麦克法登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预测项目实施的利用效率。不想这却招致他的同事——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

他喜见各种研究题目呈现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的趋势,“这样才能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分析透彻”。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依旧是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孟子·梁惠王上》中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句话谈到环境问题,讲得很简练,没有给出严整的分析方法。在今天看来,如何利用客观真实的数据,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建立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而非停留在浅层,是摆在中国经济学人面前的一道待解之题。

近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改革之路才刚刚开始,需要践行者拿出十二分的勇气和坚忍。对于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明天,萧政是相当乐观的。他强调,加强国际沟通、赢得国际学界认可是中国经济学成长的一条重要的道路。